

唐宋八大家名篇注译之五

苏轼散文

伊望 编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唐宋八大家名篇注译之五

苏轼散文

伊 塍 编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德茂 杨英杰

唐宋八大家名篇注译之五·苏轼散文

伊 堃 编著

*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830001)

装甲兵指挥学院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 5.5 印张 110 千字

2001 年 4 月修订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000

ISBN7—5371—2556—2/I·862

总定价:48.00 元(全套共 8 册)

如有印装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目 录

苏轼和他的散文·····	(1)
刑赏忠厚之至论·····	(7)
决壅蔽·····	(13)
教战守策·····	(21)
留侯论·····	(28)
贾谊论·····	(34)
晁错论·····	(40)
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劄子·····	(45)
前赤壁赋·····	(50)
后赤壁赋·····	(57)
黠鼠赋·····	(61)
浊醪有妙理赋·····	(65)
喜雨亭记·····	(72)
凌虚台记·····	(76)
文与可画员当谷偃竹记·····	(80)
超然台记·····	(87)
放鹤亭记·····	(93)
记承天寺夜游·····	(98)
记游定惠院·····	(100)
李君山房藏书记·····	(103)

祭欧阳文忠公文·····	(109)
王安石赠太傅·····	(113)
韩文公庙碑·····	(117)
三槐堂铭·····	(126)
范文正公集叙·····	(132)
江行唱和集叙·····	(138)
书蒲永升画后·····	(141)
书吴道子画后·····	(145)
方山子传·····	(148)
上梅直讲书·····	(152)

苏轼和他的散文

伊 瑩

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今四川省眉山）人，生于宋仁宗（赵祜）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卒于宋徽宗（赵佶）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享年66岁。

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多面的作家，也是北宋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在散文方面，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是北宋最大家，词是豪迈一派的开派者。从他最早的一篇文章“刑赏忠厚至论（公元1057年）算起，他度过了长达四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为我们留下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以及为数众多的散文作品。

宋代的散文运动继承着唐代韩愈“载道”、“振衰”的传统，欧阳修是其中的领袖人物，苏轼是欧阳修的追随者。一方面他继承发扬了欧阳修的观点，赞成“为文必与道俱”，要“言必中当时之过”，“文章的华采为末，而以体用为本”，“辞至于达，足矣”。坚决反对宋初以来的“求深”、“务奇”倾向。但苏轼的散文风格又不同于韩、欧。他说：“吾文如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当行于其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他这种观点表现在他的散文风格的平易自然。他的议论好标新立异，明快犀利，富有吸引力；他的记叙文绘声绘色，摇曳多姿，充满诗意美。他不用难字，不堆砌词藻，文字晓畅、疏放，而又波起浪伏，挥洒自如，有如行云流水。这些就不是韩、欧之所长了。

苏轼散文

苏轼在嘉佑二年(公元 1057 年)中进士第,后任凤翔府签判五年,熙宁二年在京任判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部,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自己要求到外地任职。熙宁四年任杭州通判三年,又先后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元丰二年(公元 1079 年)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专门摘录苏轼的诗句,控告他讽刺当时的政策,愚弄皇帝。八月十八日苏轼被捕进了御史台监狱(即乌台诗案),十一月结案,十二月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他在黄州住了四年多时间,直到哲宗(赵煦)即位,高太后听政后(公元 1086 年)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因他不赞成司马光等人排斥“新党”,废“新法”的做法,又自求外任。熙宁四年任龙图阁学士的苏轼又出任杭州,先后知颖州、鄂州、扬州。又以端明殿翰林侍读双重学士的身份知定州。绍圣元年(公元 1094 年)哲宗亲政,“新党”再度上台,尽逐“元祐党人”。苏轼一年被一降再降,后来被贬到惠州,绍圣四年再贬为琼州别驾,渡海到昌化军安置;同时,凡是同苏轼关系密切的如苏辙、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等人,都被看成苏轼党人,通通受到贬谪。元符三年(公元 1100 年)徽宗即位,苏轼以恩赦北归,定居常州,第二年就在常州逝世了。

苏轼一生经历了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个朝代。这是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逐渐形成,社会危机急剧发展的时代,也是统治阶级内部政局反复多变、党争此起彼伏的时代。苏轼卷入了这种动荡不已的政治漩涡,他的一生也就走着坎坷不平的生活道路。除了刚刚考取进士,初入仕途时期外,他经历了两次在京任职,两次自己要求外任,两次受祸被贬。他的这种几起几落的生活遭遇,造成他复杂矛盾的思想成分,对他的创作也不能不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宋代儒释道三教合一成为思想界的一般潮流，苏轼对此当然也不可能例外。但随着他在生活道路上的起落变化，他思想中的儒佛道三种思想经常相互渗透，不断地发生消长变化。有时他站在儒家治世角度，认为佛老思想是一种销蚀剂，指责士大夫们以佛老为圣人的风气；有时却又认为佛理高于儒学。儒家入世，佛家超世，道家避世，三者本来是矛盾的，而苏轼却以“外儒内道”的形式将其统一了起来。结合他的生活变化，具体表现为任职时期以儒家思想为主，贬谪时期，则以佛老思想为主。这也许和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思想是相通的吧！

苏轼的散文代表北宋古文运动的最高成就。行云流水般的活泼是他的散文的最显著特色。

苏轼散文中的政论和史论，同他的政治生活有着密切联系。他初入仕途时，怀着“奋厉有当时志”的宏大抱负，力图干一番经世济时的事业。是一副舍身报国，积极进取，风节凛然的儒者面目。反映在诗文创作上，是写了不少反映现实，表现出他确有见识的优秀篇章。如《进策》二十五篇和《思治论》等就一批充满政治革新精神的政论文章。如《思治论》提出了应“深计远虑，割爱为民”，要求革除“三患”；《决壅蔽》深刻揭露了“贿赂风行，民情壅塞”的腐败现象。虽然在他的早期作品中，但他那清雄豪健的论辩、和汪洋恣肆的文风，都已经有了他的个人创作特色。

苏轼的两次任职期，都包括了在朝任职和自己要求外任的两个阶段。前一次是在熙宁时代与王安石变法的矛盾，后一次则是元祐时代同司马光、程颐等反对改革的“旧派”在是否彻底废除“新法”上的论争。在朝任职时，他的注意中心不

能不是这些政治上的动荡和斗争，因此，在创作上，除了一些应制之作，总的数量就相对的要少些。即使当他为了躲开政治斗争漩涡而要求外任时，也并未改变其为民求活的初衷，如在密州组织百姓抗蝗救灾；在杭州兴修西湖堤坝（后人称之为“苏堤”是西湖胜景之一）等，都是他有名的政绩。由于生活面的扩大，不仅增加了他对各地的风土人情的了解，更加深了对人民生活苦难的实际感受。因此写作的数量比在朝任职时期要多得多，并且名篇佳作也不少。

包括在朝和外任两部分的整个任职时期，苏轼的散文着重在议论文（政论和史论）和记叙文（为了立碑勒石的亭台楼记）两类，大都带有应用文性质，但仍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苏轼不空谈学理，他在《留侯论》《贾谊论》《晁错论》等一批著名的史论中，说古论今，从史料中翻出新观点，深入剖析，提出自己的独到看法，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苏轼赞同和主张诗、文皆“有为而作”。他的记叙文往往借着纪事或纪游，反映出与国计民生有关的一些社会问题，或寄寓着某种人生哲理，或体现个人的政治思想和生活态度，如《喜雨亭记》由亭引出雨，由雨写到喜，表达了他关心农民耕作，与民同乐的心情。其它如《石钟山记》、《凌虚台记》、《超然台记》等，都写得活泼有致，妙趣横生；他往往在文中凭借一些物事，抒发一通议论，把写景，抒情和议论紧密结合起来融为一体。这些都是传颂一时的名篇。

元丰年间贬谪黄州，绍圣、元符年间贬谪惠州、琼州，这两个前后共达十多年的贬谪时期，是苏轼创作上的变化期，也是丰收期。

震惊朝野的“乌台诗案”是苏轼生活旅程中的重大转折

点,从此他开始了四年的黄州谪居生活。沉重的政治打击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困窘,对他的社会认识和人生态度产生了深刻影响,反映在创作上他的思想感情以及诗文风格都有明显的变化。

苏轼初到黄州似乎对贬逐生活还能淡然处之,但政治处境和生活困难使他产生的那种天涯沦落的悲苦孤寂情绪与日俱增,于是他排遣苦闷的办法就是倾心于道家的养生术。他的一批名作如《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大都写得旷达超世。这个时期的作品尽管交织着旷达和悲苦,消沉和豪迈的复杂情绪,但超然物外、随缘自适的佛老思想仍是它的基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已完全沉溺在佛老的教义中了,而只是吸取其观察事物的办法,用以保持达观的处世态度,保持对人生和美好事物的执着追求。

这个时期的散文着重抒情性,将抒情与叙事、写景、说理高度地结合起来。出现了文学散文或文学性散文,其中尤以散文赋、随笔、书简等的成就最高。前后《赤壁赋》把诗情画意和政治失意的情怀融为一体,体现了他豁达开朗的生活态度。近千年来以其巨大的艺术魅力脍炙人口,历久不衰。

苏轼的书札、序跋、杂著等随笔和杂文,在他的散文中占重要地位。他在书札中,常常坦露真情,毫不拘谨,从中可以看出他的襟怀和性格。苏轼博通诗文书画,在题记序跋中,表现了他对各类艺术的真知灼见。他在杂著中留下他的许多治学心得,如《日喻》《稼说》等文,他总是能够譬喻恰切,深入浅出地说出自己的见解,行文生动具体,并且富有哲理,不仅很能引人入胜,还能给人以启迪。他还有数量众多的书简,似乎都是毫不在意、随手拈来的。这种追求自由表达的倾向,在

后来他贬居琼州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惠州、琼州的贬谪生活，使苏轼的佛老思想比第一次贬在黄州时有进一步发展，虽然他仍然是从自我解脱、排遣苦闷的角度去汲取佛老思想，是借某些佛理作为老境的消遣而已。如果说黄州时期还常常表现出某种豁达的豪气，以及不时流露出的对受贬谪的不平怨气，那么贬居惠州、琼州时期，随着渐近老年，对佛老习染更深，因而表现为胸中已经没有什么疙瘩和牵挂了，一切顺其自然的精神境界。苏轼这个时期的创作和贬谪黄州时期既有共通的地方，也有其进入晚年的特点。除了对人生的感慨外，他从佛老思想寻求精神支柱虽处逆境而仍旧热爱生活，并从日常生活中发掘它的情趣和诗意。《浊醪有妙理赋》就已经很少有如像过去对刘伶、阮藉等酒中隐士的那份欣羡之情思了。由于生活和人生态度的变化，他在艺术上崇尚“平淡自然”，把过去曾经推重杜甫为古今诗人之首，转而推崇陶渊明压倒了一切诗人。

刑赏忠厚之至论

【题解】

这篇文章是苏轼在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考礼部进士时的论文。欧阳修主考见到这篇文章非常高兴,说:“此我辈人也。”苏轼在他的《上梅龙图书》中清楚地说:“轼长于长野,不学时文,词语甚朴,无所藻饰。意者执事欲抑浮剽之文,故宁取此,以矫其弊。”说明这篇文章之所以受到重视,不仅因为文章写得圆熟流美,并且议论也极为有理,很有说服力,非常符合北宋新古文运动的要求。

这篇文章以忠厚之至贯串全篇,从疑字着笔,结论则是一个仁字。

文章一开头从爱民忧民出发,由赏善和罚不善引起“赏疑从与”“罚疑从去”;“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的观点,赏罚的去与是为了谨刑,功罪的轻重在于免杀无辜,这就是疑的本意。最后提出:疑则举人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这就是刑赏忠厚之至的根本目的。

文章结构严谨围绕同一个主题,引经据典,反复论证,对每段引述的事,都给予婉言警语,文势悠扬起伏,笔力犀利雄健,在北宋的古文运动中起到扫荡廓清的作用。

【原文】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1]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2]；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咻之声^[3]，欢忻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

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以禅刑^[4]。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谨刑也^[5]。”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6]。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7]。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8]！尧曰：“不可”！鲧方命圯族^[9]。”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三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臣，盖亦可见矣。《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10]。”呜呼！尽之矣！

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足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11]。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以不加也。刑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

也^[12]。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己，君于如怒，乱庶遄沮^[13]。”夫君于之已乱，岂有异术哉？制其喜怒^[14]、而不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注释】

〔1〕成康：即周成王，周康王。〔2〕长者：为人忠厚、德行很好的人。哀矜：怜悯、恻隐，惩治警戒。〔3〕吁：表示不以为然的叹声。俞：表示赞许、应允的声音。〔4〕欢忻：即欢欣，心喜。惨戚：悲伤凄戚。虞夏商周之书：指《尚书》中的《舜典》、《大禹谟》、《汤诰》、《武成》等。穆王：即周穆王姬满，周昭王姬瑕之子。吕侯：是周穆王的臣子，又称甫侯，任司寇之职。祥刑：即善于使用刑罚。〔5〕惻然：悲痛的样子。无辜：指无罪的人。传：解说经义的文字，指孔安国给《书·大禹谟》“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作的传注。赏疑：是说对该赏赐的人宁可从厚，表示广恩。罚疑：是说对该惩罚的人宁可从轻处理，表示慎重用刑。才能达到忠厚的目的。〔6〕皋陶：姓偃，是舜的臣子，是掌管刑法的官员。苏轼误认为是尧的臣子。〔7〕三：多次。宥：饶恕的意思。《老学庵笔记》卷八：“东坡先生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有云：‘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人，三，尧曰宥之，三。’梅圣俞为小试官，得之以示欧阳公。公曰：‘此出何书？’圣俞曰：‘何需出处！’公以为皆偶忘之，然亦大称叹。初欲以为魁，终以此不果。及揭榜，见东坡姓名，始谓圣俞曰：‘此郎必有所据，更恨吾辈不能记耳。’及揭谢，首问之，东坡亦对曰：‘何需出处。’乃与圣俞语合。公赏其豪迈，太息不已。”杨万里《诚斋诗话》记欧阳修问苏轼：“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此见何书？’”坡曰：‘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欧退而阅之无有。他日再问坡，坡云：‘曹操灭袁绍，以袁熙妻赐其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伐纣，以姐己赐周公。操惊问何经见？’融曰：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

此。尧、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欧退而大惊曰：‘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8〕四岳：四方诸侯之长。实为上方部落的首领。鲧，帝禹的父亲，被四岳推举出来，奉尧的命令治理水患。没有成功，被尧杀死在羽山。〔9〕鲧方命圯族：鲧违抗命令残害同族。〔10〕杀不辜：杀死无罪的人。不经：不合乎常规。〔11〕忍人：即残忍的人。〔12〕赏以爵禄三名：是说赏赐的作用只限于得天爵禄的范围之内。刑以刀锯三句：是说刑罚的威力只能影响使用过刀锯的范围之内。〔13〕乱庶遄沮：《诗·小雅·巧言》：“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君子如祉，乱庶遄已。”意思是如果君子喜欢采纳贤人之言，怒斥小人的诽谤谗言，乱事就可以停止了。〔14〕制：即控制。

【译文】

在唐尧、虞舜、夏禹、商汤以及周朝的文王、武王、成王、康王这些圣君明主的时代，是那么深切地爱护人民和关怀人民，是用诚挚高尚的出自长辈关爱的方法来对待天下人民。只要做了一点好事就因此而奖赏他，并且还要颂扬他、赞美他；欢迎他有好的起点，鼓励他努力做到善始善终。只要做了一件坏事，就因此而处罚他，既要怜悯他、又要惩戒他；要他抛弃改正原来的错误，走新的道路，重新做人。所以或惊叹或赞许的声音，或欢欣鼓舞或悲惨哀戚的感情，都能从《尚书》中的《舜典》、《大禹谟》、《汤诰》、《成康》这些篇章中表现出来。

周成王、周康王逝世后，周穆王继位，周朝的朝政开始衰败，但穆王还命令他的大臣吕侯研究夏禹的赎刑方法，制定《吕刑》，布告天下，告戒他要善于使用刑法。他的话充满忧虑但并不伤感，充满威严但并非怒气冲冲，他对有罪的人显得慈爱而又能果断处理，对无罪无辜的人抱着同情怜悯的心情。所以孔子对他仍然有所肯定。孔安国在他给《书·大禹谟》的传注中说：对有疑问的奖赏，应该给予，这样做是为了扩大恩

赐的范围；对有疑问的惩罚，应该去掉惩罚，这样做是以谨慎的态度执行刑法。

在唐尧时代，皋陶当法官。有一次准备杀一个人。皋陶再三表示应该杀掉这个人，唐尧却再三地饶恕了他。因此老百姓都害怕皋陶执法的严厉坚决，欢迎唐尧量刑时的宽大。四岳举荐治水的人，说：“鲧这个人可以任用。”唐尧却反对说：“不能任用，鲧这个人会因违抗命令而毁掉他同族的人。”后来唐尧又说：“好吧，让他试试看。”为什么唐尧不听从皋陶杀掉那个人的意见，却听从了四岳的建议错误地任用鲧去治水呢？我们从这里可清楚地看到圣人的心意。《尚书》上说：“对有怀疑的罪犯，处理时应该从轻发落，对有怀疑的功绩，在奖励时应该选择从重奖励。与其在没弄清楚之前杀掉一个无罪的人，宁可不按常规而从轻发落。唉，这就把刑赏忠厚之至的道理说得十分透彻了！”

介乎可以奖励与不应该奖励之间的，奖励了就超过了仁爱的界限；介乎可以惩罚和不应该惩罚之间的，惩罚了就超过了合宜的标准。奖赏超过界限还影响不了一个正人君子的身份，惩罚超过合宜的标准，就会成为一个残忍的人。所以说仁爱的界限可以超过，合宜的标准就不能超越。古代不用爵位俸禄作为奖赏，不用刀锯来施惩罚。用爵位俸禄来作为赏赐，那么奖赏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只能在得到爵禄的人的范围内，而无法影响到得不到爵禄赏赐的人；同样的道理，对犯罪的人施用刀锯刑罚，刑罚所起的惩戒作用只限制在直接承受刀锯刑罚的人身上，其威慑力也施展不到没有受到刀锯刑罚的人身上。古代帝王们懂得，天下的好人好事是奖赏不完的，所以把爵位俸禄奖赏他们是起不了勉励作用的；同时也懂得天下

苏轼散文

的坏人坏事是无法都进行惩罚的，所以刀锯刑法是无法制止所有的犯罪的。因此对于有怀疑的奖赏或者惩罚，都应该采取仁爱宽厚的态度。用诚信、高尚的出于长辈的关爱态度和方法来对待天下人民，使人民都相互影响地跟着做诚信、高尚的人。古代帝王们的刑赏观点真是忠厚到了极点了！

《诗经》上说：“君子如果喜欢采纳贤人们所说的话，怒斥小人们的谗言诽谤，乱事就可以停止了。”君子平息乱子，难道有什么奇怪的办法吗？就是善于控制住自己的喜怒好恶情绪，总是不迷失仁爱宽厚的原则罢了。《春秋》的主张是，立法时应该严格，但对人执法时则应该从宽。按照这样的褒扬和贬谪的原则来掌握赏罚标准，也是忠厚到了极点啦！